

書叢學科會社

# 史學濟經

著南亞王

行發局書智民海上

書叢學科會社

史學濟經

著南亞王

行發局書智民海上

中國社會科學會

社會科學叢書

王亞南著

經

濟

學

史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序言

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研究，那是始於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所以，關於其歷史的敘述，即關於經濟學史這門學問的建立，還是比較晚近的事。

（一）  
惟其如此，我們現今一提論到經濟學史，特別是敘述到經濟學史，就不得不注意以次諸點，即，第一，體系問題；第二，派屬問題；第三，各家學說之焦點或核心問題。

（二）  
就第一點而論，現代經濟學的全領域，完全是由兩個不同的，或者正相反離的學說所佔據，其一是擁護資本主義的學說，其一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學說，對於前者，我們稱牠為資本主義經濟學體系；對於後者，我們稱牠為社會主義經濟學體系，或馬克斯主義經濟學體系。這兩個體系的對立，複化了，或者說，豐富了現代經濟學的內容，從而，增大了現代經濟學史的重要性。

然而，在一般的經濟學史中，大抵祇論述到資本主義經濟學體系，而把馬克斯主義經濟學體系存而不論了，即或論到，亦不過斷章取義，或輕描淡寫的點綴而已。這有種種理由，其最要者莫若格於學統的成見，和規避研究的繁難，同時這兩者又互相影響。因為，僅就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核心，即馬克斯那部洋洋大觀咄咄逼人的資本論說，那一方面固頗費我們鑽研，而他那全書中加諸異己者的無情批判與尖刻譏嘲，更令一般對於資本主義感染有素的學者，不能平心靜氣的研究了。但是，站在學問的立場上，特別是站在學史的立場上，我們不但要克復困難，我們尤且要克復成見。

無論就學理講，抑就其影響講，我們都沒有理由忽視馬克斯學說在經濟學史中的地位；像德國諾巴·里夫曼教授 (Prof. Robert Lieftmann) 所說：『馬克斯主義之在今日，與其說牠是可以闡明經濟現象的學問體系，甯不如說牠是一個信條，一種信仰。』(註) 這位學者的議論，在我看，決不會絲毫貶屈其所論對象之聲價，反之，實足以鑄成學問研究的障礙，並曝露其缺欠學者

公正的精神。

(註)見里氏所著經濟學原論第六章第五節。

然而現在贊同里夫曼教授之意見的，依舊大有人在。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會聽到另一種說法了。據羅沙·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所說：『經濟學的任務與對象，如果是在說明資本家的生產樣式之

發生，發展，擴張的法則，則其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經濟學在結局上，不

能不發現資本主義沒落的法則。』(註一)她又說：『法國英國的古典經濟學

者，是發現資本主義生存發展的法則，而馬克斯則是在半世紀後，恰從他們

中止了的地方，開始其工作。』(註二)開始『曝露資本家社會之經濟運動法

則』的工作，開始『發現資本主義沒落法則』的工作，惟其如此，所以，『由

馬克斯說明了的資本主義的無秩序，及其將來沒落的法則，確是資產階級學

者創始的經濟學的繼續。但在終局的結果上，這繼續却正是同資產階級經濟

學相反的。』(註三)把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解作是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繼

續，相反的繼續，我覺得，這是既未貶屈前者，亦未高揚後者的公允之論，而且事實也確是如此。

(註一)見日本佐野文夫所譯經濟學入門第一一八頁。

(註二)同上，第一二四頁

(註三)同上第一二五頁

不過，在學史敘述的程序上，我們是不是應當按照這兩個相反的體系，分別加以介紹呢？申言之，是不是應當先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解述過了之後，再次及於馬克斯主義經濟體系呢？關於這點，我以為不是應當與否的問題，而是可能或便利與否的問題，爲了論述上的便當，我把牠歸屬在以次的派屬問題中解答。

關於經濟學史上的派屬問題，在所謂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與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者間，顯有一個不同的認識，這，我們可以就他們各別的經濟學史著述，而得悉一個梗概。大約近似資產階級學者的這類著述，類皆先從重商主

義或重農學派講起，次及於正統學派，歷史學派，最後爲奧大利學派；而在一般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者所撰述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發達史中，大抵祇論述到重農學派和正統學派，正統學派以下，他們是認爲流俗支離，無足齒數的。

現在，我們如其依從後面這種說法，那是很可按照前述兩大對立體系，分別敘述的，因爲正統學派的殿將約翰穆勒，於一八四八年完成他的大著經濟學原論，馬克斯與昂格斯亦於同年發刊其基本論著共產宣言，即馬克斯的資本論第一卷，也是在此十餘年後就刊行的。所以，單就敘述的便利講，把資本主義經濟學體系，敘述至正統學派止，接着講到馬克斯主義經濟學體系，那是非常之好的。但以經濟學史的觀點而論，我們之不宜棄置歷史學派奧大利學派，正如同我們之不宜棄置馬克斯主義派。於是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了，即，歷史學派奧大利學派，係形成於馬克斯學說問世的前後，而且，歷史學派的後起者，乃至奧大利學派，牠們都直接間接受了馬克斯學說不少的影響；如果按照體系的次第敘述，那就難免有顧此失彼的地方了。因爲敘述



一種學史，不能不相當顧及時間的順序，否則那不獨對於學史本身是一種缺陷，而在學說淵源的探究上，也會生出許多困難。因此，就兩大對立體系分別論述的方法，我們是認為不十分圓滿的；那麼，所謂馬克斯主義經濟學體系，就祇好放在歷史學派以後，而與其他學派相提並論的稱為馬克斯主義學派了。

不過，這種敘述方法，亦不能算是十分妥當，特權其輕重利弊，姑作如此安排罷了。原來經濟學史上的派屬問題，是很難有妥善解決的。雖然前述諸種派別，大體上已為經濟學者經濟學史家所公認，但關於這各派所包屬的經濟學者，却就有許多大費斟酌了。比如，在重農學派中，顧爾奈 (Cournot)，杜爾閣 (Turgot) 是否應當列入，學者間多有爭論，法國薩伊 (I. B. Say) 歸屬在正統學派陣營中，原無不可，若德國屠能 (Thunen)，美國加雷 (H. C. Carey) 之編入，那就稍涉牽強了。此外，所謂講壇社會主義者之別稱新歷史學派，瑪先爾教授 (Prof. Marshall) 輩之別稱新正統派，均係因派屬之

限制拘牽，致不能不曲爲比附，而像法國有名經濟學者西斯孟底 (Sismondi)

之『立於經濟學史上主要思潮之傍流，占有其獨自的地步，』(註)遂不免爲

一般拘拘派屬關係之經濟學史家所摒棄了。英國英格拉姆 (Ingram) 教授所著

政治經濟學史採用國別分類法，也許是有見及此吧，但國別分類對於各國經

濟學者，雖不致有所遺脫，對於經濟學史本身，却就不免有割裂破碎之嫌了

。況且，經濟學史與經濟思想史不同，祇要能把有名經濟學者之主要諸學說

，循其系統，究其根源，詳加解述，則其餘無關重要之斷片思想，不但不妨

存置，甚且應當割愛了。因此，關於經濟學史的敘述，與其採用國別法，把

大大小小的經濟學者，比列起來，以亂混經濟學系統，就甯不如明其派系，

辨其重輕，把小經濟學者歸屬在大經濟學者底下敘述，把支派位置在主流底

下敘述，那樣得體多了。

(註)見李甯著浪漫派經濟學批判序文。

最後，我要談到各家學說之焦點或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對於經濟學史

的敘述上非常重要，但非常不容易討論。就經濟學上主要各派的經濟學大師講，他們的學說，當然都有一個核心，我們在解述其學說時，如其不抓住那核心，那就真是不知道從何說起。比如，重農學派主導者魁奈氏的偉大作品，就是他那由五行線聯結六個出發點與六個回歸點構成的經濟表，反之，正統學派主導者亞當斯密的大著，却是他那牽涉極廣，多所包容的七八十萬言的國富論，後者固然是太繁難了，前者却又是太簡單了，但我們如其把握住了他們整個學說的核心，繁難與簡單都不成問題。

不過，一家學說之核心的認識，却又不是如我們偶然想像的那樣容易，第一，那須具有辨認一家學說的充分學力，其次，還須剔除任意捨捨的主觀成見。茲僅就後一點來說吧。任憑那家的學說，祇要由兩個觀點不同的人，加以論述，那一定會得出彼此不同或全然相反的結果。同是魁奈的經濟學說，亞當斯密所注意的是自由貿易理論，馬克斯所注意的則是總再生產理論；同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歷史學派所批難的是方法論，奧大利學派所批難

的則是價值論。每個經濟學者都多少不免帶有幾分成見，從而，各家經濟學說就似乎不只一個核心了。

但看官的眼睛無論是近視，遠視，抑是亂視，事物終歸是有其本色的。歷史學派儘管重視亞當斯密的方法論，奧大利學派儘管重視其價值論，而在亞當斯密學說本身，究有其根本的核心，有其執一馭萬的焦點。他那大著國富論，是廣泛的涉及了各種經濟原理，經濟政策，但貫透於這各種原理政策中的，却是他的個人主義思想，以及企圖實現那種思想的自由主義政策，他的中心主張確定了，然後就容易判別其分工論，貨幣論，價值論，地租論等等，在全學說中所佔的地位，然後就容易批隙導窾的加以論列了。在亞當斯密的學說是如此，對於其他經濟學者的經濟學說，亦自沒有兩樣。

可是，論到這裏，我們還須注意一點。即，關於各家學說的介紹，我們首先固當把握其中心思想，但這中心思想確定了，同時，其全學說中各種原理原則亦經抉別過了之後，我們更須就某派各家學說，做一番精審統籌乘除

損益的工夫。比如，關於價值，地租，利潤，工資等主要經濟形態，那幾乎是每個經濟學者都要論到的，單就正統派諸經濟學大師說，亞當斯密，馬爾薩斯，里嘉圖，約翰穆勒等，都頗努力於這諸般經濟形態的分析，但我們介紹這各家的學說，却不宜一一刻板論列，而當權其輕重，計其精粗，使有伸縮增減的餘地。例如，地租論在斯密學說中是較為疏懈的，我們不妨歸屬在里嘉圖地租學說中連帶介紹；價值論在馬爾薩斯學說中是較為膚淺的，我們不妨歸屬在論述傑姆斯·穆勒與馬克洛克的價值學說時連帶介紹；至若約翰·穆勒關於價值，地租，利潤諸端的努力鑽研，我們認為他沒有令人滿意，甚至沒有令他自己滿意的新的發現，所以我們介紹他的學說，頂好是不要論及這些，而把有用的篇幅，去解述他那嶄新的分配論與半截的社會主義思想。

對於各家各派的學說，能如上面這樣權宜精密的安排介紹，那不獨可以避免機械刻板之嫌，且能增進我們對於經濟學史的理解，增加我們研究經濟學史的興趣。——然而想把這層做到恰到好處，那亦是談何容易哩！

總上所述，我們第一知道了，經濟學史領域內，確然存在有兩個對立的體系：資本主義經濟學體系與馬克斯主義經濟學體系，雖然我們在敘述上，不便於顯明各別的按照這兩個體系來作綱領；第二知道了，經濟學史的敘述，雖然祇好採用既經爲一般所採用的分派法，但我們應明瞭這種方法的缺點，並應隨時儘可能的救治這缺點；第三知道了，對於各家學說的介紹，我們不但要以公平的學史的態度，把握住其根本的核心，同時還要靈透的技術的手腕，去伸縮變動其配列的程序。

因此，我們與其說經濟學史是既經建立了的一種學問，就甯不如說，那是尙待建造尙待努力的一種學問。這樣看來，現在世界先進各國，尙不曾出現一部包羅的完整的縝密的經濟學史，那就用不着責難，亦用不着奇怪了。

在文化落後，特別是對於經濟學至近年始漸感興趣的中國，關於經濟學各方面的著述，當然是十分缺乏的，但現在確已感到了十分的需要。楊幼炯先生爲民智書局主編社會科學叢書，及大學高中教本，要我擔任經濟學史的

撰述，我幾經惶悚之後，終於不揣固陋的把這項工作承擔下來了。這工作由我來擔任，當然是過於僭越，但當我承擔這僭越工作時，我還覺得非常感傷哩！

在數年以前，由我的摯友郭大力君的提議，我們立定了一個譯述世界經濟名著的計劃。預譯的書，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論，及馬克斯的資本論，預定的年限，是六年乃至八年。我們定立這個計劃，有幾種動機：第一，經濟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本學問，在社會科學風靡一時，且變為時尚的中國，頗需要人來做這種切實的笨工；第二，把學問的研究與主義的宣傳，混為一談，那幾乎是今日中國異常普遍的錯誤。就在研究者自身，他們亦是嚴立門戶，比如，資本主義經濟研究者，每視資本論一類著述為危險物；而馬克斯主義經濟研究者，又視國富論一類著述為過時物，其實在學問本身是不能這樣狹隘和猜忌的。我們之所以要由資本主義經濟著述，譯到馬克斯的著述的

，一方面固然是因着研究的興致，同時也期望能由此確立開明的研究精神；第三，在學無素養，而又置身在主義滿前，意見龐雜的中國的我們，自覺埋頭做這類譯述工作，是再好沒有的，因為這不但可以穩定我們學問的根基，且可以抑止我們偏見的發露。

記得自那個計劃決定之後，我們還附帶表示：前述五部大著順序譯成了，再合寫一部由亞當斯密到馬克斯，以後就開始我們國內各地的旅行。

這個計劃是從民國十八年開始的，其間雖因彼此的生活費關係，閒還做了一點零碎的譯作，但到去年底，里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及亞當斯密的富國論，先後都在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了。這種不時髦的大部頭書，該社肯特予迅速出版，並且肯預支若干版稅，我們當然非常感謝該社主編者與出版者的友誼與雅量。

本來在國富論下卷的譯稿交去付印後，我們即打算着手譯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第二版，但據同書社主編者王禮錫兄告知我，該社因營業關係，不克



繼續成就我們那『名山事業』，即不能繼續給予我們的預支，此後，我們還向其他書局接洽過，仍無結果，於是因了肚皮不遷就意志的關係，我們不得不暫時中止這種工作，而另謀生路了。

就在這當中，有勞李石岑先生的介紹，我與楊幼炯先生成了莫逆的交遊，在李楊兩先生多方鼓勵與贊助之下，我勉強把撰述經濟學史的工作擔負下來了。這時，我當然異常感謝石岑先生，特別是幼炯先生的盛意，但每一念及我們既經計劃的工作，實不勝其感慨係之了。

當我着手經濟學史的撰述時，我同朋友大力同住在上海，這部書的大體輪廓，可以說是由我們共同決定的；以後，他遷往蘇州了，我每寫完一章，即把那章的大綱細目寄他糾正；上卷全書草成後，他又詳細精密的爲我校訂一遍，這樣，署名我著的經濟學史問世了。不過，書中如有錯誤缺陷的地方，當然不能牽累我的朋友來替我負責。

本書所有的參考書目，皆詳細附列在下卷末尾。關於各國最近的主要經